

民众与遗产：以上海为重点的若干考察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复旦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杨志刚

民众与遗产的关系，既是体现现代“遗产”概念之精髓的关键，也是现代社会考量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如是说，乃基于笔者如下的思考结果：1、现代遗产观念的萌发，与近代公共博物馆的诞生同步。换句话说，反映在博物馆开放问题上的共享意识，构筑了现代遗产观念的一个重要基础。2、近几十年来，“遗产”的话语在全球范围爆炸并急剧扩散，此一过程显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项目的推动有关，但深层地看，则与全球化趋势中现代社会一些基本理念的重新熔铸相表里。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笔者高度赞赏将民众生活与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的考察视角。本文以上海的实践和经验为基础，探讨民众与遗产之关系的若干问题；先从公共博物馆入手，继而将视线扩展至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和利用。

中国的博物馆萌芽于上海。1868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韩伯禄（Heude，又名韩德）来到上海，在西南角的徐家汇一那里是西方文化进入上海乃至全国的一个重要基地，创建博物馆，英文名称是：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1883年建成馆舍，中文名叫“徐家汇博物院”，每日午后准人参观，不收费，也无入场券。入门后须投名片，即有人招待参观。及至1929年，该馆并入震旦大学，并迁到吕班路（现重庆南路），改名为“震旦博物馆”。但震旦博物馆不向社会开放。

1874年由英国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创立的上海博物院（又名亚洲文会博物院），可称为在中国出现的第二个博物馆。1886年，该馆所在的圆明园路因此改名为博物院路（即今邻近外滩的虎丘路），可见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正是有此背景，1895年，中国维新派建立的上海强学会提出建设博物馆，并将此立为四项要务之一。梁启超《论学会》一文也呼吁“开博物院”（载1896年11月5日《时务报》）。

回溯博物馆在上海的出现，是想表明这同时也是近代以来“民众与遗产”之思想的发轫。1857年秋天，上海文理学会（2年后改名为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初创之时，《北华捷报》即发表评论，“相信它将成为……便利公众的文化资源”。1878年，文会自己明确提出，“上海博物院……要为公众服务”。据研究，19世纪90年代，该院已天天向公众开放，包括“周一、周二下午向华人开放”。（参见王毅著：《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公共博物馆在上海的发展并不顺利，直到1949年才总共只有5-6家。除以上两家，还有警察博物馆（1935年创建，隶属于上海警察局）、上海市博物馆（1937年1月开馆）、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1938年创建）和松江县教育图书博物馆（创始于1915年，1937年毁于战火）。何况开放的情况也不如人意。

上世纪的50和80-90年代，上海的博物馆有较快的发展，而今更处在大发展时期。根据1997年出版的《上海文物博物馆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其时上海有博物馆、纪念馆34家，其他陈列室、陈列馆15家。如果数字能够说明问题，我想再举几个数字：

- 1、2002年，被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认可的博物馆、纪念馆已达64座。
- 2、截至2007年6月底，上海的博物馆、纪念馆总数是106座。
- 3、预计到2010年，上海的博物馆、纪念馆将达到150座。

公共博物馆的增多，固然反映了民众有更多的机会亲近遗产、共享遗产。可是“民众与遗产”的关系，又绝不是简单地能靠上述数字来体现的。比如，如果博物馆不能吸引公众，门可罗雀，或者它与民众的生活毫不相干，那就很难说博物馆真正实现了其价值、遗产已被民众所共享。从这个角度看，上海的不少博物馆，都还有待改进工作思路和运作方式，在让遗产走近（或走进）民众生活方面多下功夫。

值得关注的是，“社区博物馆”的理念在最近几年得到传播，并对博物馆工作起到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一些博物馆自觉地改变形象、拿出措施，吸引公众走进博物馆，同时也想方设法让博物馆进入社区、校园。由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这些年公众对博物馆和遗产的兴趣也逐渐升温，当然也就提出了更高的精神需求。

基于以上变化，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博物馆开始出现。今年5月，我参观了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欣喜地发现“民众与遗产”这个命题在那里得到生动地诠释，我多年在博物馆学和文化遗产领域寻找的某些价值，在那里找到了注脚，得到了初步的落实。高桥位于浦东北端，是江南水乡古镇，1129年设乡，历史悠久，文物荟萃，人才辈出。高桥历史文化陈列馆由高桥镇创建和管理，征集了600多件展品，95%属真品，多数来自民间。它们不仅浓缩了高桥870余年的历史，反映了当地的生产生活和风土民情，而且积淀了收藏者对乡土文化的热爱，进而又激发了当地民众对社区的认同和自豪感。该馆的建筑也颇有特点，是一处傍水的民国时期砖木结构两层住宅，中西合璧，名仰贤堂，经动迁和维修后，用作展厅。该馆在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正式对外开放。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恰好是“博物馆与共同的遗产”，其中需要关注的理当包括：民众的生活与博物馆。

可以对上述话题进行补充或佐证的，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和文物保护单位等保护与利用的有关状况。上海已公布四批优秀历史建筑，共632处、2138幢，合计480多平方米。另有1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四十处市级历史文物建筑（这三个系统有交叉）。在近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和中国文化遗产日（每年六月的第二个周六）期间，这其中的一部分，都会按照有关部门的规定，向市民开放。比如，2004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上海23处优秀历史文物建筑免费向市民开放一天，参观人数达到4万6千人次。2005年5月下旬的双休日，40处老建筑免费开放两天，参观人次达17.7万。一些参观点人满为患的现象，在今年文化遗产日的免费开放中，同样表现得很突出。这既显示了民众向往、亲近遗产的热情，也体现了民众与遗产之间客观上所存在的距离。今年4月5日我在考察作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明公所”时，遭遇邻近某保险公司门卫阻拦的经历，更折射出问题多多。问题的核心，或许可表达为：谁的遗产？谁的遗产保护？

上海是中国较早关注“民众与遗产”之关系的地方，时至今日，这个城市有它的成功之处，然而不足也是明显的。如果对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的发生、发展，建立一种文明观加以审视，则“民众与遗产”之关系就是衡量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杆。有意识地以此引领中国文化遗产事业当下和未来的发展，将有助于确保这项事业是健康的、可持续的。